

金融海嘯對非營利組織的衝擊

張英陣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摘要

此次的金融海嘯是全球自 1930 年代以來遭遇到的最大經濟危機，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股票市場及房地產無不受到波及，許多人也因失業或資產縮水而影響其生活品質，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及許多國家的弱勢人口遭受負面的衝擊最大。根據專家的預測，金融海嘯的衝擊還會延續多年，因此除了經濟面向的因應策略之外，更應該思考如何解決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本文強調當前的社會政策應揚棄新右派及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政府應該更積極介入因金融海嘯所增加的福利需求。也因為金融海嘯產生諸多的社會問題，急難救助、就業服務、住宅服務、財務諮商及家庭服務的需求增加，政府實在無力承擔，因此更需要非營利部門共同提供服務。但全球的非營利組織因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也面臨財務危機與人力需求的壓力。所以，政府應拋棄契約採購的方式，採用更具有彈性的補助措施來贊助非營利組織，同時也應在公共決策上落實真正的夥伴關係。

關鍵字：金融海嘯、金融危機、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

壹、前言

許多專家對金融海嘯的分析與預測各有不同的觀點，有些人認為金融海嘯已過，景氣應該會慢慢復甦；也有專家認為金融海嘯真正嚴重的影響還沒開始，甚至也認為景氣不可能在短期內復甦。2006 年 9 月 7 日，經濟學家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應邀在國際貨幣基金會演講時宣稱經濟危機已在醞釀形成，接下來他又預測美國將面臨最嚴重的房市破產、石油危機、消費者信心下降，不免會導致大蕭條。在那場國際貨幣基金會演講的聽眾都對魯比尼的預測抱持懷疑的態度，另一位經濟學家巴納吉（Anirvan Banerji）認為魯比尼的預測缺乏任何數理模式的根據，並說「任何停擺的時鐘，一天之中也會兩次的時間是對的」，以此來嘲諷魯比尼對經濟危機的預測（Mihm, 2008）。2007 年以後的經濟情況證明魯比尼的預測是正確的，美國確實遭遇 19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魯比尼也預

測失業、公司破產及阻礙經濟復甦的諸多因素還需要拖上好幾年。趨勢專家大前研一也預測全球經濟復原可能還需要十年(狄英、莊素玉, 2009)。

不論是經濟景氣即將復甦, 或還要等上十年, 但眼前因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已經浮現。基本上, 個人相信魯比尼的預測, 認為金融危機尚未結束。我們固然要立即採取行動解決當前的問題, 像是「馬上關懷急難救助」或「立即上工」等方案, 但也不應只是採取短期的策略, 有人認為在金融危機下匆匆忙忙採取行動是最危險的事 (Collins, 2008); 而且也不該期待「馬上會好」, 更不應該只是經濟面的考量, 我們此時更需要的是針對金融危機及其所帶來的衝擊採取策略性的思考與對策。

金融海嘯確實帶來更多失業、擴大貧富懸殊、衍生個人及家庭困擾等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不過這也正是給我們檢討與回應問題的新契機。回顧社會工作在 19 世紀末的發展, 不也是試圖解決工業化社會所帶來的危機嗎? 從 1930 年代開始, 社會福利蓬勃發展, 不也是企圖回應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危機嗎? 今天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 難道不也是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的新契機嗎?

自由主義的病毒蔓延?

從 2007 年金融危機慢慢浮現之後, 指控經濟自由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導致金融危機的聲音變慢慢出現, 各國政要例如法國總統薩柯齊 (Nicolas Sarkozy)、德國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 (Peer Steinbrück) 等都宣稱, 美國式的自由放任意識形態、市場機制萬能的觀念已面臨終結 (Vucheva, 2008)。當然, 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對此宣稱不以為然, 認為政府的干預才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主因 (Reisman, 2008)。

不可否認, 此次的金融危機起因於美國的次級房貸。美國近百家承作次級房貸的金融機構陸續宣告破產, 這些經過證券化的次級房貸金融商品價值暴跌, 遍佈全球的持有者及全球股市莫不受到牽連 (林金賢, 2008)。引發金融體系借貸失衡, 難道不是人類貪婪的後果? 從美國金融機構的破產而引發全球的金融危機, 這難道不是自由主義病毒 (liberal virus) 的蔓延? 經濟學家沙米爾·阿敏 (Amin, 2004) 認為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透過其軍事力量推廣至全球, 是一種獨特且危險的力量。它之所以獨特且具危險性, 是因法國大革命所要散播的自由主義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理念; 而美國所要推銷的自由主義是純粹以資本利益為基礎, 是一種野蠻的行為、是掠奪自然資源且迫害窮人生活的自由主義。所以, 阿敏稱之為自由主義的病毒。

阿敏所謂的自由主義病毒其實就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或新右派(New Right) 的觀點，新自由主義相信個人的利益(self-interest)¹是經濟活動最主要的動力，而市場競爭是最有效的生產與分配方式，只有透過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才能使經濟成長與繁榮，如此才能保障所有人類的長期福祉；政府過度介入福利服務，只會造成福利依賴，破壞了人們的工作倫理與市場競爭力(Fives, 2008 ; Taylor, 2007)。當前我們所關切的是，自由主義的病毒是不是已經侵害台灣？而且這病毒是不是會侵襲我們的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福利服務並不是真正的商品(real commodities)，它是波蘭尼(Polanyi, 1944/2001)所謂的虛假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並不適合在自由市場中交換。所以，Gøsta Esping-Andersen 認為商品化、社會階層及家庭化是資本主義的三大致命傷。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運作幾乎完全仰賴市場以維生，導致人們過度工作(overwork) 與物質主義(materialism)，社會階層帶來更大的不平等與階級差異，保守的父權式家庭帶來性別不平等，社會福利所提供的保護是確保人類可維持一個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水準(古允文譯, 1999 ; Patulny, 2005)。而 Esping-Andersen 也以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 作為區分福利體制的重要指標之一，認為在社會民主體制的福利國家越少依賴市場提供福利服務。

可是近幾年來，我們看到台灣的社會政策似乎越走向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在公共政策中仍以「經濟優先」，且強調短期的經濟效率。在福利決策與執行中，充滿契約文化(contract culture) 的福利採購、強調效率的績效指標、對經濟弱者福利依賴的苛責、中央與地方政府主計單位對福利支出之刻薄，也顯現出我們的社會政策中也具有自由主義的病毒。

1980 年代，紀爾德(Gilder, 1981)、莫瑞(Murray, 1984) 及米德(Mead, 1986) 在討論美國的福利依賴時，當時的台灣尚未有完整的福利制度足以讓福利接受者產生依賴，更重要的是我們相信福利接受者是在不得已的狀況下接受社會救助，是許多結構性因素造成家庭的貧窮。但是，這幾年來，特別是金融海嘯以後，作者問過不少社會工作人員、村里幹事、鄉鎮公所基層社福工作者、年輕的學生及一般社會大眾，似乎越來越多人相信台灣已經有福利依賴現象的存在。在金融海嘯後有幾位負責執行「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的工作人員形容部分的受助者簡直是「福利流氓」，也就是有部分人不試圖去就業，反而是藉由各種手段企圖獲得福利資

¹ 我們經常引用 Adam Smith 所謂「看不見的手」之概念來說明在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下，個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動機能獲得最佳的交換，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但我們也不該遺忘，Adam Smith 生前最後修改的著作是道德情感論，他主張同情的道德情操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請參閱謝宗林、李華夏譯(2000)，謝宗林譯(2007)。

源。也有基層社福工作人員感嘆，哪些善於連結社會資源的部分受扶助家庭，其福利所得都接近辛勤工作的社福工作者。以前，社會工作者及社工系的學生，不論是實際個人傾向或在團體壓力之下，總要說自己比較傾向社會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現在越多人「勇於」承認，自己相信自由主義或新右派的觀點。

不可否認，當前的大環境越來越市場化與商業化。醫療與法律是十三世紀形成最古老的專業之一，當時都是為了社會上需要的人及弱勢的農人所提供的慈善服務，可是近代醫療與法律的商業化，造成醫療與法律資源運用的不公平，似乎只有少數權貴能比一般社會大眾擁有更好的服務。即使是百年樹人的教育也越來越商業化（楊振富譯，2004），就像教育部的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竟然要求以「就業能力」為重點，德國的哲學暨政治批判學者史特拉斯爾（Johano Strasser）就對此有所批評，他認為將「就業能力」這樣的概念冠在現代人身上，其實是「人們為經濟服務，而把人視為貨品」，也是「人們為了市場目標把自己工具化」的具體表現（吳信如譯，2004）；近年來，許多非營利組織在募款困難及政府經費補助緊縮的狀況下，熱衷於採用市場機制經營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而忘了思考市場機制是否會破壞非營利組織的核心價值，那隻看不見的手會不會遮蓋了非營利組織的社會性目的，使得非營利組織與市場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難道我們真得抵擋不住自由主義市場化的潮流？或如同布赫迪厄（Bourdieu, 1998）所說，「社會」工作僅是補救市場邏輯的不適當性？

人們經常在一句「此為大勢所趨」的壓力下而放棄努力、不再奮鬥以嘗試改變。假如自由主義真得給人類帶來更多幸福，我們當然樂於跟著潮流走，問題是以市場取向的自由主義並沒有為絕大多數人帶來更幸福。市場導向自由主義的趨力合理化了人性自私的一面，資本家從其中獲得最大利益，雖然企業主們也愈來愈懂得以企業社會責任、分紅入股、年終績效獎勵等手段來分配、涓滴（trickle down）其剩餘利益，讓絕大多數受雇者也能在虛假意識中自認成功。但這樣的社會力量其實產生了庸俗的物質主義，讓更多人在反覆追逐名利、物質滿足的遊戲中疲於奔命。而國家的撤退，將生活的大部分皆依賴經濟價值為標準，這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回歸（return of individualism），也難怪責備受害者的論調逐漸普遍（Bourdieu, 1998）。因此，個人與家庭責任、工作福利（workfare）成為社會福利不可拒絕的選擇。

社會政策是人類企圖改善困境、改變「殘忍的命運」（brute luck）²、追求美好

² Stuart White (2003) 認為殘忍的命運所產生的不幸無法歸咎於個人，因為一個人可能一出生就是在貧窮的家庭，或是一出生就是身心障礙者（引自 Prabhakar, 2008）。

社會 (good society) 所做的努力。我們固然相信人類有自私的一面，但也相信人類有追求良善的一面。自由主義所追求的私利不須我們鼓吹，它仍然會持續存在，如果它真是人性的本質？可是，我們需要努力嘗試的是，如何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懷的關係，這也是社會福利學家笛姆斯 (Richard Titmuss) 所強調的社會福利價值。也是天主教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關切當前全球的社會議題時，於 2009 年 6 月所發布之《在真理中的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 通諭中所揭示的精神 (Pope Benedict XVI, 2009)，他認為不論是親朋好友的微型關係 (micro-relationships) 或包含社會、政治及經濟等面向的巨視關係 (macro-relationships)，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以愛 (love, charity) 為核心。金融海嘯的衝擊逐漸浮現，失業人口會繼續增加，需要社會福利協助的家庭也將繼續成長，在多數人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之下，我們的社會政策更應具備慈悲心，應更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連帶關係，國家更應積極介入福利服務，社會政策在此時的重要性更不低於經濟政策。所以，金融海嘯應該是社會政策的新契機。

貳、公、私夥伴關係的省思

就需求面來講，金融海嘯後帶來更多的社會服務需求，可是在供給面該如何因應這些增加的需求呢？金融海嘯帶來許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恐怕不是政府部門所能單獨解決的。此時政府在公共服務的輸送上，更需要民間組織的共同生產 (co-production) 以解決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可是金融海嘯不僅給民間組織帶來更多的服務需求，同時也給民間組織帶來更大的財務壓力以及工作人力需求。過去政府一再強調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但從社會福利供給的實務來看，民間提供福利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只不過政府的「小媳婦」或「隱形的夥伴」。當金融海嘯帶來更多的福利需求時，政府也更迫切需要非營利組織的合作。這應該是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重新檢視夥伴關係的新契機。

全球的金融危機也同樣給全球的非營利組織帶來財務危機，台灣的社會福利界宣稱，2008 年已進入最寒冷的「募款冰河期」，澳洲的非營利組織則稱為「募款的乾旱期」(donation drought) (Shergold, 2009)，許多國家的非營利組織也都面臨同樣的問題，甚至提出警訊強調最嚴重的時刻還尚未到來。金融海嘯之所以造成非營利組織的財務壓力，除了服務需求提升之外，股市套牢、私人捐贈減少及政府預算緊縮都是重要的因素。根據美國伊利諾州在 2008 年以經濟危機對服務性及贊助的非營利組織所造成的影響之調查，調查結果發現服務型及贊助型的非營利組織皆認為在經濟危機之後，營運經費與資產皆有減少的現象。七成的贊助組織

指出資產與收入沒有成長對其組織的運作有極大的影響，四成五的服務型非營利組織指出它們沒有足夠的儲備金來應付日常的運作。服務型非營利組織特別指出，在金融危機之後，政府的經費補助縮減以及經費延遲撥款的影響大於企業與個人捐款的減少。該調查也驗證了過去的研究結論，認為經濟危機對非營利組織真正產生較大的影響是危機後的第二年至第三年，所以服務型非營利組織與贊助組織都尚未真正面臨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大衝擊（Donors Forum, 2008）。

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在金融海嘯之後，也經常看到大型知名的非營利組織在媒體上紕漏捐款人數與捐款額度的減少，那些小型的非營利組織所遭受的衝擊更不在話下。大家也別忘了，金融海嘯導致更嚴重的家庭貧富懸殊，同樣的也造成非營利組織募款的貧富懸殊。固然不管規模大小的非營利組織可能都會因金融海嘯而捐款減少，但是大型知名的非營利組織可能透過各種媒體管道向大眾訴求財務困難，而且本身也有專業的募款人從事勸募，仍舊比較能吸引捐款者的青睞。根據台灣聯勸募協會指出，中小企業的公益捐款較不受金融海嘯的影響，但企業界的捐款對象通常是知名度較高的非營利組織。雖然小型非營利組織的營運成本較低，比較有彈性應付經濟危機，但財源短缺所受的衝擊仍大。因此，政府在金融海嘯後更應積極贊助小型非營利組織，更應避免經費撥款的延誤，因為小型非營利組織更缺乏營運的儲備基金。

有研究指出，非營利組織與經濟榮枯並非同步發展，通常是在經濟倒退一年之後，非營利組織會更容易感受到經濟的壓力，而此經濟壓力會在經濟不景氣兩年之後持續存在，甚至持續更久（Bowman, 2003; Donors Forum, 2008; Pratt, 2003）。因此，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補助關係與方式在此時更需要有所調整，否則非營利組織可能在解決金融海嘯的問題時，沒有能力成為政府的真正夥伴。面對非營利組織普遍遭受財務困難，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補助更需要逆向思考，此時反而需要政府更多的經費補助，以及將每年度的補助延長為三年的補助，好讓非營利組織有財力面對金融海嘯所增加的服務量，而且再次強調政府應極力避免延遲撥款。當然很多人要質疑，經濟不景氣政府財政困難，哪有可能增加對非營利組織的補助。個人認為是決策者需要意識形態的轉換，例如在稅制上想討好有錢人，認為如此就可以鼓勵有錢人投資以繁榮經濟，這只是造成更大的貧富懸殊。如果決策者認為在困苦的年代，社會福利是最佳的長期投資策略，相信在真正善用資源時，會願意也會有能力對非營利組織的社會福利服務提供更多的經費補助。

當政府引進市場機制之後，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就產生極大的改變。既然多數公共服務並非真正的商品，政府不應將自己定位是福利服務的採購者，而將非營

利組織視為純粹的服務供給者，而採用採購程序來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贊助關係。雖然這種觀點似乎是當前的主流觀點，但是這種契約文化充分展現了新右派與新管理主義的觀點。真的夥伴關係應該是朋友，而不是市場的買賣關係，何況建立在契約文化的關係往往使非營利組織成為公共服務的廉價勞力。因此，在思考未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贊助關係，是否應拋棄採購法的程序，從契約文化重新轉型到補助文化（grant culture）。

長期以來，我們都一直強調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要建立夥伴關係，夥伴關係顧名思義是一個權力對等的關係。事實上，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的角色上經常是扮演「不平等的夥伴」（unequal partner）、「小媳婦」（junior partner）、「邊際角色」（marginal role）、「邊陲的局內人」（peripheral insiders）或「隱形夥伴」（invisible partners）等等微不足道的角色（Craig & Taylor, 2000）。面對金融海嘯的諸多問題，政府確實更需要非營利組織這位夥伴，但這位夥伴不僅是公共服務的共同生產者，更應該是公共政策的共同決策者，如此的決策分享不在於幾席虛有其表的委員席次，更重要的是落實政策諮詢（policy consultation），從政策議題形成至決策與執行的共同參與。

前面已經談到，福利服務並非真正的商品，政府不應將自己定位是福利服務的採購者，而將非營利組織視為純粹的服務供給者，而採用採購程序來看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贊助關係。雖然這種觀點似乎是當前的主流觀點，但是這種契約文化充分展現了新右派與新管理主義的觀點。真的夥伴關係應該是朋友，而不是市場的買賣關係，何況建立在契約文化的關係往往使非營利組織成為公共服務的廉價勞力。因此，在思考未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贊助關係，是否應拋棄採購法的程序，從契約文化重新轉型到補助文化（grant culture）。

長期以來，我們都一直強調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要建立夥伴關係，夥伴關係顧名思義是一個權力對等的關係。事實上，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的角色上經常是扮演「不平等的夥伴」（unequal partner）、「小媳婦」（junior partner）、「邊際角色」（marginal role）、「邊陲的局內人」（peripheral insiders）或「隱形夥伴」（invisible partners）等等微不足道的角色（Craig & Taylor, 2000）。面對金融海嘯的諸多問題，政府確實更需要非營利組織這位夥伴，但這位夥伴不僅是公共服務的共同生產者，更應該是公共政策的共同決策者，如此的決策分享不在於幾席虛有其表的委員席次，更重要的是落實政策諮詢（policy consultation），從政策議題形成至決策與執行的共同參與。金融海嘯之後政府更應積極思考與非營利組織共同簽訂盟約（compact），此刻正是建立夥伴關係的新契機。

參、結語

2008 年的金融海嘯是 1930 年代以來全球最大的經濟危機，起因於許多資本家追求個人利益的貪婪，而造成金融海嘯的自由放任主義也影響社會政策的決策者、社會工作人員及一般社會大眾。社會似乎越來越強調個人與家庭需要自己承擔生活的風險，越趨向以市場機制來提供福利服務。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恐怕最困難的時刻還沒到來，此時我們更應起來抵擋自由主義的病毒，藉由國家積極的介入福利服務來解決當前及未來的社會問題。面對金融海嘯固然要有應急的措施，但因為金融海嘯的衝擊將會持續數年，更應該要考慮社會政策的永續性。

金融海嘯帶來更多的福利需求，可是政府部門並無能力單獨承擔所增加的公共服務，所以更需要與非營利部門攜手，共同滿足金融海嘯所增加的福利需求。過去公、私部門在公共服務供給的合作過程中，雖然強調的是夥伴關係，實質上非營利部門經常變成廉價的替代品。面對金融海嘯的衝擊，政府應拋棄新右派及新管理主義的影響，不要再將政府定位為服務的採購者，我們期待的是一個「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³ 的政府，而不是一個「新管理主義」的政府。政府也不該將社會福利當成是市場的商品，透過採購程序與非營利組織建立契約式的贊助關係；除了服務供給之外，與非營利組織建立盟約，落實政策諮詢，建立公共決策真正的夥伴關係也是此刻該掌握的契機。

參考文獻

- 古允文譯，G. Esping-Andersen 原著（1999）。《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台北：巨流。
- 狄英、莊素玉（2009）。〈越洋專訪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如何讓台灣變成生活大國？〉，《天下雜誌》，第 416 期，2009 年 2 月。
- 林金賢（2008）。〈淺談次級房貸〉，《暨大電子雜誌》，第五十期，上網日期：2009 年 5 月 15 日，取自暨南國際大學網頁
<http://beaver.dlec.ncnu.tw/project/emag/article/200805/淺談次級房貸.pdf>。
- 吳信如譯，J. Strasser 原著（2004）。《生活或生存：反對人類成為市場要素》。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楊振富譯，D. Bok 原著（2004）。《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台北：天下文化。

³ Dehardt & Dehardt (2000) 批評新管理主義中強調政府掌握方向盤 (steering) 的角色，他們認為政府是屬於人民的，政府的責任是服務與充權公民，也要努力搖槳 (rowing) 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 謝宗林、李華夏譯，Adam Smith 原著（2000）。《國富論》。台北：先覺。
- 謝宗林譯，Adam Smith 原著（2007）。《道德情感論》。台北：五南。
- Amin, S. (2004). *The liberal virus: Permanent war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ourdieu, P. (1998).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Bowman, W. (2003). *Fiscal crisis in the states: Its impact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people they serve*. Washington, DC: The Aspen Institute.
- Collins, P. (2008). Introduction. In P. Collins and P. Harrington (Ed.). *After the apocalypse: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p. 7-9. London: Demos.
- Craig, G., & Taylor, M. (2000). Evaluating local compacts: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cal public sector bodies and the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sectors. *Working Paper No. 3*, University Of Hull and University of Brighton.
- Denhardt, R. B., & Denhardt, J.V. (2000).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0(6), 549-559.
- Donors Forum (2008). *Economic crisis weighs on nonprofit sector*. Retrieved 2009-06-06, from <http://www.donorsforum.org>.
- Five, A. (2008).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debates in welfa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ilder, G. (1981).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ihm, S. (August 17, 2008). *Dr. Doom*. The New York Times. Retrieved 2009-07-16, from [http://www.nytimes.com/2008/08/17/magazine/17pessimist-t.html?](http://www.nytimes.com/2008/08/17/magazine/17pessimist-t.html)
- Mead, L.M. (1986).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 Murray, C.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Patulny, R. (2005). Social rights and social capital: Welfare and co-operation in complex global society. *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 6(1), 59-75.
- Polanyi, K. (1944/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Pope Benedict XVI (2009). *Caritas in veritate*. Rome: Vatican.
- Pratt, J. (2003). The nonprofit sector's downward slope: How steep and how long?

Nonprofit Quarterly, 9(2), 22-27.

Reisman, G. (October 23, 2008). *The myth that laissez faire is responsible for our present crisis*. Retrieved 2009-06-20, from <http://mises.org/strong/3165>.

Shergold, P. (2009). *The challenges of economic recession for nonprofit strategy*. Briefing Paper No. 2, The Centre for Social Impact, School of Business, Kensington, New South Wales.

Taylor, G. (2007). *Ideology and welfa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Vucheva, E. (June 8, 2008).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is finished, says France. Retrieved 2009-07-19, from EUobserver, <http://euobserver.com/9/26814?print=1>.

作者簡介

張英陣

現 職：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學 歷：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社會福利博士

經 歷：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台灣大學約聘助理

中央研究院約聘助理

實昕貿易公司公共關係專員。

陸軍少尉

研究專長：非營利組織管理、志願服務研究、社會政策分析、質化研究方法論

Social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 of Financial Crisis

Ying-Chen Cha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is the most severe economic recession since 1930s. Around the world stock markets and real estate markets have fallen,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collapsed; many households have lost their propert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vulnerable population world-wide were worst affected. Many economists forecast that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meltdown will last for coming years. Social policy decision makers should have a strategic thinking to plan acute assistance and sustainable projects for dealing the impacts. Current social policies should also give away the influences of the New Right or Neo-liberalism. State intervention should play more positive role to satisfy the increasing welfare needs caus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government nee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nonprofit sector to deliver social assistance, employment service, housing service, financial planning counselling and family service. However, most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are hit by the financial tsunami. They are affected by shrinking financial support due to donation drough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may consider giving up the current procurement policy replaced by a more flexible funding structure for the nonprofit sector. Besides, the nonprofit sector is not only the partner of public services delivery, but also true joint decision maker with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housing policy and asset agenda which were long neglected by social policy makers. The author truly believes that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turning point for the social policy.

Keywords: financial crisis, social policy